

# 让艺术之花照亮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钟文平

10月31日,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闭幕了。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从圣地延安到古都长安,从节日展演到展览场馆,从大会发言到专家评议,从媒体宣传到街谈巷议,“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最为核心、最具分量的关键词。人民的节日共享人民的艺术,人民的艺术绽放在盛大的节日。绚烂嫣红的艺术之花,把一个意气风发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的祖国照耀得更加灿烂夺目。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邀请72位文艺工作者,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在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他语重心长地讲道:“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两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热烈响应座谈会的号召,以奋勇的责任担当、澎湃的创造激情,广泛深入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感受时代的脉搏,聆听人民的呼声。他们收获了丰富的

素材,汲取了飞扬的灵感,夯实了深沉的思想,敞开了广阔的胸襟。一部部精品力作,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中国艺术节是以国家名义举办的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艺术活动。这一艺术盛会,正是观察近年来文艺界创作整体态势、检验一段时间以来文艺创作最新成果的最好机遇。从所有参赛参展作品来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正在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共识和行动指南,“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正在成为他们最深层次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追求。

历届艺术节的焦点都是文华奖的评选。本届文华奖是按照中央要求修订改善评奖办法、大幅压缩评奖项目、提高评奖含金量后的首次评奖。本次获得文华奖的剧目,或聚焦于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或反映平凡人物的英雄事迹、或挖掘个体灵魂的救赎与超越、或表达家国情怀的伟岸与高洁,无不体现出人民利益的至高无上。获得文华表

演奖的10名演员,都是长期扎根于人民生活之中,推陈出新,精益求精,用卓越的艺术创造获得专家高度评价,引起观众热烈反响的优秀文艺工作者。群星奖参赛作品和获奖作品,着眼广阔的基层社会,紧扣时代脉搏,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群星奖将文化惠民贯穿于评奖全过程,参赛作品均注重深入基层进行演出,评选过程中,各地共举办展演选拔1.43万场,观众达1083万人次。

在其他门类的艺术展示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也得到更大程度的展现。第十一届全国优秀舞蹈节目展演“十一艺术节”专场演出是舞蹈节目历史上第一次以组合形式参加中国艺术节,精彩的演出获得了满堂喝彩;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和首次举办的书法篆刻作品展、摄影作品展统一纳入展览框架,共汇集了近三年来自中国美术、书法篆刻、摄影创作的优秀作品1000余件。在活动组织方面,“十一艺术节”的人民性充分体现在观众参与的低门槛和广泛性上,形式各异

的惠民活动,充分的低票价,农民工、环卫工人、困难家庭、武警部队官兵、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场馆建设者等社会群体的成员,成为各大剧场和惠民活动的座上宾,这一切都表明人民群众共享人民艺术成为艺术节的强劲主旋律。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举办的第一个艺术节,艺术节在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同志发表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地方拉开帷幕,并在享有光荣人民文艺传统的陕西省召开,这一切昭示着当代文艺工作者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自信、赓续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艺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的决心和勇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广大文艺工作者将从本届艺术节的风采和经验中,汲取更大的智慧和力量,以更加辉煌的艺术创造,树立起属于这个时代的伟大艺术丰碑!



黄卓绘

如果没有夏威夷附近海域突如其来的海浪导致船体剧烈晃动引发的意外,11月5日或6日,在那段独自一人乘风破浪跨越太平洋的旅行的终点上海,郭川这位冒险精神与荣誉赞歌交织的航海“疯子”将带着新的世界纪录,让人们再度簇拥、钦佩、抑或继续不解……

生命没有假设,人生与大海一样时刻会涌起风浪。不幸的是,10月25日15时后,郭川在航行至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时,与岸上团队及亲友失去联系。如今搜寻仍在继续,家人及亲朋发动、协调各方力量展开搜救,包括将食品、瓶装水、救生衣、救生信号等抛放在相关海域,期盼奇迹的发生。

事实上,在用海水洗头、用雨水洗澡的郭川身上,一段段挑战人生、开拓前行的奇迹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仅是探险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张扬,更是对求稳、中庸、安于现状等传统思维的突破,是一种用个体之力、亲身践行的实践精神。在信息纷纭的现实生活中,在各类间接经验“鲜活”呈现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孤帆远影的躬行之力显得尤为珍贵,也给予人们更多的启示和鼓励。

身体力行历来可贵。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中的这段话,可以看成是孔子的自谦,更是其对“躬行”的信奉与推崇。可叹的是,“聪明人”总是在行动之前夹杂了过多的考量与收益预期,精于计算一次万里独航的风险与艰辛需要付出多大的名利,却忘了这一算式本身仅以世俗功利的所谓成功为“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之外的所有结果都不被认可,连得出结果的漫长过程也被忽略,哪怕海天一线、云卷云舒多么令人陶醉,哪怕劈风斩浪、挑战自我、追逐理想让人享有无可替代的获得感及愉悦!

我们往往把世俗的评判当成判断自己是否要出发的重要依据,从而多了一份羁绊,少了一股秉承内心意愿的率性而为。与此同时,我们习惯于把别人的一手经验“借

鉴”到自己的人生中,貌似“善假于物”,实则“受制于物”,不知不觉间放弃了与世界相处的N种方式。郭川是一位不受约束的勇士。身为航海家,他凭借着10多年的航海生涯中创造的诸多第一,成为国人的骄傲。他是首位中国职业远洋帆船手,也是首位通过帆船传递奥运火炬的奥运火炬手,是首位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中国人,并创造了40英尺级帆船单人环球航行的世界纪录。身为人生的“海员”,他从工程师到金融创投,又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MBA到帆船手,一次次驶离自己熟悉的“海域”,把内心的召唤变成行动本身,勇于开拓实践,驾驭起自己的人生之旅。作为躬行君子,他永远在路上……

## 躬行君子永在拼搏中

秦毅

## 假如萧红没有遇到鲁迅

红孩

鲁迅先生逝世80周年了,报端陆续看到几篇纪念文章。人们纪念先生,大都是从儿时读他的文章谈起。无需多言,在新中国走过的60多年中,大凡读过中小学的人,谁没读过几篇鲁迅的文章呢?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鲁迅的文章也不曾禁止过。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奇迹。

其实,鲁迅的文章主要分三个部分,一是小说,二是散文,三是杂文,至于诗歌、书信一般只有专门研究鲁迅的人才会展看。我觉得,鲁迅的作品确实是经典作品,自白话文以后,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这样名篇众多,塑造人物形象众多的!包括茅盾、老舍、巴金那样的大作家。我们评价一个作家,标准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其作品的艺术性。而事实决非如此。纵观很多功成名就的作家,他们之所以被后人记住追捧,有相当多的并不完全在于作品的优秀,还包括他们在政治、思想、权力、爱情以及社会活动等诸多要素中的影响力。就大多数名家而言,他们一般都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如鲁迅、郭沫若、齐白石、梅兰芳、老舍等。

前些日子,我有幸到浙江海宁去

了两日。海宁虽然是个县级市,在近代却是赫赫有名,仅文化艺术界就有图书馆学家张宗祥、昆曲名家徐凌云、佛教革新家太虚、著名诗人徐志摩、著名科普作家贾祖璋、电影事业奠基人史东山、著名戏剧家沙可夫、著名作家金庸、英语专家许国璋等几十位名家诞生于此。我到海宁,当然是为徐志摩来的,再有就是为每年秋天的钱塘江大潮。可惜的是,我来的时日,已经错过观潮的最佳时节,便只可去感悟徐志摩了。

去海宁徐志摩故居,正逢下着小雨。陪同的当地诗人问我不要打伞,我想都没想说:“徐志摩是诗魔,他能疯狂,我也能疯狂,我就要在雨中去会这位传奇的诗人。”自古以来,诗人大多有怪癖,也有趣闻轶事,更有风流佳话。在参观完徐志摩的生平展览后,我说:“一个人在他身后,能够留下那么大名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学界早逝的有两个,一个是徐志摩,另一个是萧红。”关于徐志摩的一生,我概括为:一个富家子弟,为了实现父亲寄子的“学而优则仕”,于21岁开始到美国、英国留学,本来是学金融的,因为思想的改变而喜爱尼采和罗

素,于是他违背了父亲的初衷到英国去拜访罗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他没有见到罗素,而偶遇林徽因,由此他真正的开始出入于上流社会,拜访、结交中外名流。回国后,他在诗名日盛后,又开始了爱情的新生。最让其风光无限的是因为泰戈尔的到来,使他与林徽因这对金童玉女相伴于左右,这使他在文艺界出尽了风头。徐志摩的诗是一流的,他的社交能力也是一流的,他的爱情婚姻的此起彼伏则是超一流的。他的空中遇难,成就了他的千古绝唱。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假如他父亲不让他出国,假如他不热爱罗素,假如他没有遇到泰戈尔,假如他没有发生浪漫的爱情故事,年仅36岁的徐志摩能是今天的徐志摩吗?

同样,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县一个普通乡村的女子萧红,如果不是对家庭的叛逆,如果不是赶上哈尔滨那场大雨,如果没有遇到萧军,如果他和萧军没有想到要去上海见鲁迅,萧红的命运就不是后来的样子。前年和去年,我分别看了两个版本的根据萧红经历改编的电影,前者为小宋佳版的《萧红》,后者为汤唯版的《黄金时代》。前者是按传统的时间顺序拍摄的自传体,后者是时空

交错由不同的人以讲述形式呈现的板块体。两相比较,我更喜欢后者。由于我跟萧军一家来往较多,自然对萧红也就情有独钟。在我写过多篇有关萧红的文章后,有朋友经常会问我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和萧红的爱情故事,甚至有人直接问我萧红和鲁迅先生到底产生爱情没有?我的回答是:萧红的作品固然有她的独特性,但如果没有了这四个男人,特别是没有了鲁迅先生,萧红是很难被文坛关注的。至于萧红和鲁迅先生产生爱情与否,以我对萧红所有的经历来看,她对大先生的爱是多种感情的融合,既有师生,也有父女,当然也会有男女之间的好感。萧红在上海发现萧军和别的女人好上以后,她对大先生的感情一直无法超越,从而迫使她必须远离这两个男人,只好孤身一人远走日本。同样,鲁迅和萧军在对待萧红的感情上也是复杂的。也许因为复杂,才成就了他们各自后来的命运吧。对于萧军和萧红这对年轻的情侣而言,爱情固然重要,但远没有他们认识鲁迅先生、被文坛接受更重要。萧红的命运是坎坷的,也是幸运的。这点同徐志摩比较起来,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来,这该是文坛永恒的话题吧。

## 写公众号等于赚大钱?

含黛

随着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一些知名度高的公众号日进斗金,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条新的发财之路,便也写起了公众号。但事与愿违,大多数人连一个星期都坚持不下来便放弃了。

其实,这是对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误解。公众号主要的赚钱方式主要有广告、打赏、电商等。而这些方式都是建立在巨大的阅读量和粉丝量的基础之上的,想成功运营一个公众号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能力很强的团队进行专业的商业运作才行,仅凭个人的单打独斗和

一阵热情很难成功。阅读量将直接影响公众号的广告效果,于是就有一些公众号不惜一切手段造假,前段时间,微信系统升级让不少大V公众号的真实阅读量曝光,一些平常看上去阅读量上万的大V公众号,一夜之间阅读量直线下降。这背后其实是一条围绕巨大利益而形成的黑色产业链,而这些采用非法手段只为追求阅读量而不注重内容的公众号们,暂时或许可以赚点小钱,但最终一定会被人们抛弃,被市场淘汰。所以,认为写公众号就能赚大钱的认识有

些太简单幼稚。

但不可以否认,确实有一些运营得很成功的个人公众号,他们从中获取了很丰厚的收益。这些人能够取得成功首先是得益于信息灵通,转型早;其次是本身就从事过媒体工作,具备很强的专业能力;还有就是个人的努力程度,不要只看到人家的公众号开得很风生水起,背后可是艰辛不易的十几年不间断的坚持啊。少数个例的成功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此,不可简单地把写公众号和赚大钱划等号。

我认为,对待个人写公众号首先要摒弃浮躁的心态,不要有一夜暴富的想法,不可一味地追求阅读量,更不能为增加阅读量而不择手段。最好是把它当成一个纯写作的平台,抱着无功利写作的态度去写,有明确定位,服务特定阅读人群,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也更容易坚持下去。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公众号不是那些所谓的大号、大V们,有原创内容才是永恒不变的核心。当你真正能够静下心来深耕细作自己的公众号时,赚钱的机会或许真的会出现。

## 文化,社会的黏合剂

赵旭东

从一种已知的人类进行的谱系上看,最初人类的组织性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庞大规模。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在一瞬间聚拢起数以十万、百万计甚至更多的人,而微信的技术平台使得一种更大人群的虚拟“在一起”变得方便易得。而这背后很明显是一种文化的凝聚力在发挥其实际的效应,文化担负起一种社会黏合剂的作用,使得四处分散开来的个体、人群可以相互联系并结合在一起,成为更大的社会组织。在此意义上,社会不过就是一个可以任意放大的容器,而真正能够使得容器之内的三三两两的事物勾连在一起形成一种一体性存在的只可能是文化这种独特的黏合剂,文化会使得个体成为群体。文化具有一种在人群中制造共同意识的能力。它从观念上赋予了每个人以一种可以达至共同

理解并保持彼此认同的表征,由此分散开来生活的个体形成了彼此一致的共同意识、共同主张以及共同生活,在此之上,对于每样事物都是相互分离的“一盘散沙”的社会而言,文化犹如磁石一般,其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将难以收拢起来的沙中铁粉颗粒以及细微粉状的多样复杂的独立个体的存在都聚集在了一起,这恐怕是其他制度形态所不具备的能力。

在传统的时代中,人们是通过各种文化的途径而实现了一种共同生存意义之上的彼此合作。此种合作使得人的自我生存能力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人们由此而进入到了一种有婚姻、家庭、世系以及财产继承的文明化时代,这种文明化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水准的提升以及与之相伴的知识的普及、技术的发达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所有这

些都在促使作为个体化的个人的一种对于文化存在的自我感知,并可以由此而不过上一种有自觉意识的文化化的生活,文化因此不再是一种自为的无意识的存在,而是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自觉意识,成为生存观念中一种有意识的文化自觉。

随着现代文明的日益推进,理性的生活虽然占了一种主导,但很显然,作为孤立个体的人更加会去寻找一种可以使彼此分离开来的人相互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这背后的原因大约可以这样去看,由于一种现代分离技术的野蛮生长而使得人过度依赖于一种抽象化的个体存在,远离了彼此之间可以合作与帮助的文化。但随着这种分离技术的过度膨胀,一种反弹的文化力量也强劲地发生。由此而导致当下世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期待即融入彼此连接

的社会之中去,这些期望必然要通过文化的途径而得到满足,由此人们才可以重新在一起。人们相比以往更加热情地在创造着各种“在一起”——聚在一起、聊在一起、吃在一起,总之,每一个厌倦个体抽象化的现代人都会乐于去享受这种彼此在一起的快乐,由此去试图摆脱那种作为一种现代人的个体生活的种种不快乐或者苦闷。

文化把日益分离开来的个体之间的裂缝又重新结合在了一起,它在一定意义上也修饰了现代生活的资本化和个体化所造就的赤裸裸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弥合了同样是由现代人所造就的个体自身生活和一种经年累月的传统之间的彻底断裂所带来的难以修复的裂痕。文化在此意义上,作为一种黏合剂的能力而做着一种修补裂缝、疗愈创伤的社会治疗者的工作。

## 我们可以向王阳明学什么?

李权

近年来,王阳明传记及其著作成为坊间受到热捧的读物,各种书店都要有几本和王阳明有关的著作。一位哲学家能够引发大众如此的聚焦和关注,不能不引人深思。

王阳明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与朱熹一起被目为中国近古以来思想学说的两座高峰。黄宗羲论及王学时说:“以教学者支离眩惑、务华而绝根之病,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现代思想学术奠基人蔡元培也说:“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王阳明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生于浙江余姚,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活了57岁。诏赠新建侯,谥文成。之所以号阳明,是因为王阳明青年时曾结庐于浙江会稽山阳明洞,尝自号阳明子,后世遂以称焉。

今日重读阳明学说,可注意者当有如下三段:新圣人观、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此三段,彼此连属,对于今日重构乡村社会秩序,意义深远。早期儒家强调“修身”,宋元以来,理学兴盛,士子读书于“修身”之外,进而以“成圣”自许。直至清代,读书界风习还是如此,因此曾国藩尝有名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阳明学是理学到明代的重大发展。王阳明生逢其世,虽同意儒学前贤“圣人之所以为圣,以其生而知之”,但却主张“良知人人皆有”“人胸中各有个圣人”。王氏尝谓:“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

人,而在我矣。”“新圣人观”不止肯定个人品德的可完美性,而且充分体现个体对身处社会的价值理想。

针对朱熹的“新民说”,阳明主张“亲民”。朱子学说涉及天地、君国,阳明学说则更多论及孝悌仁慈、日常伦理。这些相异的背后,是自明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分化相应加剧,民间矛盾日益表面化。王阳明敏锐意识到,社会已经发展到仅凭以往朱子所谓依靠为政者个人修养而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德政、教化不足以应对的地步。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倡导推广乡约、保甲,讲万物一体之仁、孝悌仁慈、日常伦理,寄希望于地方士绅、父老,进行自下而上的秩序构建。

阳明思想与普及的背景,多归结于明初理学的僵硬与政治腐败两大因素。从弘治到正德、嘉靖时期(1488—1566),皇帝与文官集团关系从融洽渐趋紧张而对立,社会新的阶层形成,民间矛盾日益表面化,士风颓靡,士子激愤,迷失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生于此时的王阳明,其人生在走过濒临死亡的恐惧与沮丧后,龙场一悟不但标志着他个人走出生命绝境,找到人生真正的价值,其所领悟而开创的新学风,更为那个时代的士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积极进取、救世济民的儒学之道。

今日中国,从顶层设计到民间努力都在倡导价值和秩序重建,中国人可以从先贤明哲的训谕中获得灵感和启示。至于因为时代变迁而导致的欠缺和错位,就需要每个人凭借现代观念去甄别选择了。